

二十一世紀評論

反思左右之爭：平等的追求？

中國式經濟民主之爭中的 主義與問題

辛磊

「平等」和「自由」是政治哲學中的一對關鍵範疇。作為其在經濟思想領域的對應物，經濟民主和經濟自由之間一直存在張力。與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也存在關於經濟民主的爭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經濟民主之爭的表現形式及其意識形態背景都是特殊的。

「平等」和「自由」是政治哲學中的一對關鍵範疇。作為其在經濟思想領域的對應物，經濟民主和經濟自由之間一直存在張力。與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也存在關於經濟民主的爭論。但是，中國的經濟民主之爭的表現形式及其意識形態背景都是特殊的。

在中國，經濟民主之爭經歷了三次熱潮。第一次熱潮出現在1990年代初期，經濟民主的主要倡導者是林子力、蔣一葦等學界前輩。這一時期的經濟民主之爭局限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界，沒有在思想界產生明顯的影響^①。第二次熱潮由崔之元在1990年代中期推動，並引發了自由主義者的激烈回擊。這場爭論在《二十一世紀》、《讀書》等刊物上展開，被視為「新左派」浮出水面、知識界開始分裂的標誌之一^②。近年來，隨着崔之元、汪暉等人連續地圍繞經濟民主或社會民主闡發立場、展開論述，經濟民主問題再次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掀起第三次熱潮^③。

中國的經濟民主之爭具有兩種表現形式：第一種形式是左右兩翼在1990年代進行的直接交鋒，第二種形式是左右兩翼在近期展開的間接對抗。近年來，自由主義者在經濟民主之爭的第三次熱潮中集體缺席，其結果是此次爭論成為新左派的獨角戲。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兩派在這一問題上形成了共識。實際上，在對立格局已經固化、經濟民主成為新左派所主張的民主的核心內容的情況下，自由主義者並沒有改變立場，他們的缺席應該被理解為「默殺」或「腹誅」。換言之，經濟民主之爭仍然在持續，只不過換了一種形式而已。很明顯，和當下的怪異對陣相比，1990年代的激烈爭論的建設性要高一些。

作為左右兩派在經濟民主問題上的一次全面交鋒，1990年代中期兩派的爭論主要圍繞「在當下的中國提倡經濟民主究竟是『制度創新』還是『制度復舊』」、「鞍鋼憲法」的背景和效果」等問題展開^④，沒有深入地討論推行經濟民主的具體途徑。但更為重要的是，除個別例外，關於經濟民主的近期研究仍然沒有涉及具體的政策設計，而是停留在原則討論的階段。崔之元關於「國有資產收益歸公」或「全

民分紅」問題的討論當屬為數不多的例外。但是這些討論也是高度理論化的，並沒有具體化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⑤。一言以蔽之，無論從論戰的表現形式，還是從論戰的主題來看，中國的經濟民主之爭都具有中國特色：這一論戰既反映了中國思想界左右對峙的基本格局，也體現了中國思想界避實就虛的論述風格。

中國式經濟民主之爭以上述形式展開的原因既有表層的，也有深層的。就前者而言，在全國性、權威性、制度化的學術共同體形成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具有「同人團體」性質的學術圈子。這些圈子往往橫跨不同學科，完全可以自給自足。因此，即使沒有持不同意見者參與，這些跨學科的學術圈子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具體問題進行「全方位」的討論。就後者來說，對於經濟民主、特別是對於是否應該在中國推行經濟民主這一議題持有不同立場的思想派別，在意識形態方面存在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非常尖銳，以至於屏蔽了與「甚麼是經濟民主」和「為甚麼要推行經濟民主」相關聯的、具有實際意義的具體問題。在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討論的情況下，「如何推行經濟民主」這一重大問題根本無從談起。借用五四時期的術語，「主義」對於「問題」的屏蔽使論戰雙方失去了通過對話來磨礪己方主張的機會，扼殺了雙方求同存異、共同推動改革進程的可能性。

近年來，不斷有學者倡導以對話來實現左右兩翼的和解並形成共識，但是這些努力收效甚微。在這樣的環境下，溝通左右兩翼關於經濟民主的認識似乎無異於天方夜譚，任何試圖從中立的立場來討論經濟民主問題的人都可能動輒得咎。然而，對於思想界的健康發展而言，左右兩翼的相互激蕩當然是必不可少的。作為泛左翼的一員，筆者對新左派對經濟平等以及經濟平等與政治民主之間的關係的持續關注一直懷有敬意^⑥。同時，筆者也注意到自由主義往往被有意或無意地誤讀，而且自由主義陣營內部也存在不同的派別，因此不能排除進行對話的可能性。更為重要的是，在筆者看來，在除去意識形態的屏蔽，進入具體問題的層面之後，我們很可能發現左右兩翼的對立並非是不可調和的，而那些具有可操作性的經濟民主方案有可能為破解當前的改革困局提供機會。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學界關於經濟民主問題的討論橫跨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主題紛繁，內容複雜；崔之元等學者在這一領域的近期研究也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因此，對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不是本文可以勝任的任務。本文的目的只是從平等——經濟民主論的邏輯起點——出發來討論阻礙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就經濟民主問題進行深入交流的意識形態背景，展示被意識形態之爭屏蔽的、可以讓兩派展開討論的具體議題，推動具有可操作性的經濟民主政策的落實。

一 「主義」的對決

在中國式經濟民主之爭背後，存在着兩組「主義」的對決。其中一組「主義」的對決的影響是直觀的，而另外一組「主義」的對決的影響則是隱秘的。正是

近年來，不斷有學者倡導以對話來實現左右兩翼的和解並形成共識，但是這些努力收效甚微。在這樣的環境下，溝通左右兩翼關於經濟民主的認識似乎無異於天方夜譚，任何試圖從中立的立場來討論經濟民主問題的人都可能動輒得咎。

這樣兩組「主義」的對決左右了中國的經濟民主之爭的走向，並使之具有中國特色。

首先，中國式經濟民主之爭是「精英主義民主觀」和「大眾主義民主觀」之間的對抗的表現。精英主義民主觀依託的是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以來的主流民主理論，強調以競爭性、周期性選舉為核心的多黨間對抗和結構性制衡；大眾主義民主觀繼承的是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馬克思的民主觀念，其要點在於「人民主權」或「人民民主」。很明顯，這樣兩種民主觀之間存在強烈的張力。薩托利 (Giovanni Sartori) 正是從前者出發，將經濟民主斥為「放浪形骸的概念」^⑦，而王紹光也正是依據後者將現代西方國家的民主實踐視為對古典民主精神的背叛和矮化，是背離「真正的民主」的「贗品」^⑧。在這樣兩種幾近南轅北轍的民主觀支配之下，論戰雙方自然很難進行有意義的討論。

「精英主義民主觀」強調以競爭性、周期性選舉為核心的多黨間對抗和結構性制衡；大眾主義民主觀的要點在於「人民主權」或「人民民主」。在這樣兩種幾近南轅北轍的民主觀支配之下，論戰雙方自然很難進行有意義的討論。

主流民主理論之所以可以稱為「精英主義民主觀」，是因為其建立在代議制的基礎上。在主流民主理論的框架之下，政策只能由選民選出的少數代表來制訂。至於盧梭和馬克思的民主理論之所以可以稱為「大眾主義民主觀」，是因為其試圖建立一種在政治上可以讓眾多平民直接參與或發揮更大作用的制度框架。在主流民主理論家看來，所謂「民主」，主要指政治民主或競爭性的選舉機制，其他形式的民主，比如韋伯夫婦 (Sydney and Beatrice Webb) 倡導的產業民主和社區自治意義上的社會民主，不但和政治民主不在一個層次之上，而且只有存在競爭性選舉的前提下才有討論的必要。更為重要的是，主流民主理論家認為，所謂「經濟民主」遠遠超過了產業民主和社會民主的範圍，其本質是一種「共產主義經濟」^⑨，是對政治民主的徹底否定。持精英主義民主觀的學者排斥經濟民主議題的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相反，在新左派看來，古希臘民主是民主的源頭，其特徵是以抽籤選舉和公民大會為代表的直接參與；而所謂「現代民主」，不但通過在民主之前附加「自由」和「憲政」來限制民主的範圍，而且通過代議制和競爭性選舉來排斥大多數人的參政機會^⑩。在這樣的邏輯之下，他們主張重建古希臘意義上的民主，即推動人民群眾直接參與並主導的民主。但是，這裏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在人口遠遠超過古希臘的現代國家推行直接民主。儘管新左派理論家試圖在現代社會重新挖掘抽籤選舉的價值，但是這種思路的可行性顯然不高。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經濟活動和廣大民眾直接相關，所以經濟民主自然成為新左派極為重視的議題^⑪。

進一步說，如果兩種民主觀的對立塑造了中國的經濟民主之爭的基本格局，那麼「市場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分殊則將兩派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進一步放大。這裏所說的「市場主義」是指中國多數自由主義者的市場觀。這種市場觀推崇私有化和自由競爭，主張政府的介入應該局限在健全法制基礎、維護社會信用等方面。因此，這種觀念的持有者強烈地反對國家對於經濟自由的限制。客觀地說，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這種市場觀不同於所謂「市場原教旨主義」，但是這種觀念基本上是以美國式市場經濟為主要參照系的。在下文中我們將會看到，這種認知模式嚴重地影響了自由主義者對於經濟民主問題的思考。

精英主義民主觀和市場主義之間的聯繫是自然的，但是國家主義在邏輯上卻並不是西方新左派理論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相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

正是西方新左派興起的基礎之一，在西方新左派理論家之中與國家主義保持距離、甚至對其採取排斥態度者亦不乏其人。然而，中國的新左派理論家在整體上卻對國家主義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看來，這種熱情在以下兩方面只能形容為異乎尋常：

第一，儘管新左派理論家並沒有否定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但是對於市場機制之中存在的問題的批判卻構成了他們的研究的出發點。這一點在崔之元那裏得到了最為理論化的論證，並在王紹光那裏獲得了最為充分的展開。在崔之元看來，公司有限責任制、中央銀行制度和破產法在美國經濟中遇到的挑戰意味着西方經濟中存在着大量的「預算軟約束」現象，「看不見的手」的範式不是完美無暇的^②。因此，徹底的私有化不是最好的出路。相反，在堅持社會主義民主的前提下，保留國有企業並開展包括合作社在內的多種經濟形式之間的競爭才是理想的方案。如下文所述，崔之元主張的宏觀和微觀的經濟民主，在相當程度上分別和國有經濟以及合作社所體現的組織原則高度重合。因此，他的論述實際上指出了市場經濟的缺陷，意味着中國需要走經濟民主之路。很明顯，由於為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意義上的「經濟民主」預留了空間，所以他的論述並不直接指向國家主義。但同樣明顯的是，這樣的論述方式也為國家主義打開了大門。實際上，崔之元關於經濟民主問題的近期論述更多地着眼於國家的作用^③。相對而言，王紹光的一系列研究強調中央政府在改革的過程中應該強化財政能力、集中權限，以回應變化了的中央—地方關係、抑制市場化所產生的問題，其國家主義色彩更為明顯^④。

第二，一般來說，市場、國家和社會是市場經濟中的三種主要協調機制。因此，對於市場機制的批判並不必然導向國家主義。但是，對於市場機制持保留態度的中國新左派理論家對公民社會的負面評價則顯現了其國家主義立場。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那裏，公民社會的發展是連接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關鍵中間環節^⑤。換言之，公民社會的發展構建出對政治權力的「社會制衡機制」，從而為多元主義民主奠定了組織基礎，而「一個獨立於國家的多元的、自我管理的公民社會，是民主社會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也是從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到達爾(Robert A. Dahl)的民主思想的精髓^⑥。但是，在中國的新左派看來，公民社會理論忽視了階級因素，高估了公民社會組織的獨立性和制約功能，其意識形態的基因是自由主義。他們進一步指出，公民社會的發展或許可以提高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的能力，但是未必可以帶來民主，問題的關鍵在於推行「站在人民立場的國家干預」，改造公民社會^⑦。

崔之元關於經濟民主問題的近期論述更多地着眼於國家的作用，而王紹光的一系列研究強調中央政府在改革的過程中應該強化財政能力、集中權限，以回應變化了的中央—地方關係、抑制市場化所產生的問題，其國家主義色彩更為明顯。

二 被「主義」屏蔽的「問題」

上述兩組對立的意識形態疊加的結果是中國的經濟民主之爭呈現出特異的形態：這種疊加使左右兩翼在經濟民主問題上表現出結構性的對立，而這種對立使雙方難以對「甚麼是經濟民主」、「為甚麼要推行經濟民主」和「如何推行經濟民主」等三個密切相關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並形成共識。

對新左派來說，「甚麼是經濟民主」似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依據崔之元的定義，在宏觀上，經濟民主旨在將「人民主權」貫徹到經濟領域，使各項經濟制度依據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調整；在微觀上，經濟民主旨在促進企業貫徹後福特主義 (Post-Fordism) 的民主管理，依靠勞動者的創造性來提高經濟效率¹⁸。上述定義既有描述型定義的成份，也有揭示型定義的特徵。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邏輯上，「為甚麼要推行經濟民主」這一問題先於「甚麼是經濟民主」而存在。就筆者的閱讀範圍而言，除王紹光的簡略分析之外，新左派似乎沒有直接論述為甚麼要推行經濟民主。在王紹光看來，推行經濟民主的原因有二：第一，人類生活的很大部分是在工作場所度過的。因此，如果沒有工作場所的經濟民主，那麼即使政治生活是民主的，人們還是無法達到自由的狀態；第二，經濟民主的缺乏將導致收入、地位、掌握的信息等方面的差距，並進而影響政治民主的實現¹⁹。

依據崔之元的定義，在宏觀上，經濟民主旨在將「人民主權」貫徹到經濟領域，使各項經濟制度依據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調整；在微觀上，經濟民主旨在促進企業貫徹後福特主義的民主管理，依靠勞動者的創造性來提高經濟效率。

從王紹光的上述分析和新左派的相關理論工作出發，我們可以大致推導出他們支持經濟民主的理由——那就是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²⁰。換言之，對於新左派而言，推行經濟民主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經濟原因：前者指「人民主權」必然要求在經濟制度方面貫徹民主原則；而後者指經濟民主、特別是微觀層面的經濟民主可以提高經濟效率。但是在當下的中國，從平等出發來論證經濟民主的必要性，不但將在邏輯上產生一些新左派所忽視的問題，而且會受到生產方式變遷所帶來的挑戰。

如果將平等視為推行經濟民主的最為重要的理由之一，那麼對於中國的經濟民主論者而言，兩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將不可避免地浮現出來：

首先，如果說平等原則在經濟領域中具有無法妥協的關鍵地位，那麼我們必須同時處理經濟領域中的三種平等，即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平等、勞動者階層內部的平等以及資本和資本之間的平等。然而，新左派重視的僅僅是第一種平等，對於其他兩種平等則基本沒有進行討論。如果說後兩種平等只在邏輯上存在、在現實中沒有意義的話，那麼這種處理方式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在於後兩種平等不但在其他國家的經濟民主實踐中佔有重要地位，而且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更為關鍵的是，在將資本與資本之間的平等以及勞動者階層內部的平等納入視野之後，我們可能很難斷言宏觀層面的經濟民主，特別是壟斷國企的存在是否真正符合勞動者的利益、是否能夠減少經濟不平等。因此，新左派對於經濟民主類型的把握不但可能無法與西方國家的實踐對接，而且可能脫離了中國的現實。

其次，如果我們能夠證明基於經濟平等原則的經濟民主必然或者很可能提高經濟效率的話，那麼經濟平等將是支持在企業內部推行經濟民主的一個「強理由」；可是，如果我們無法完成這種論證，那麼經濟平等對於企業內部的經濟民主的支撐將大大減弱，可能只具有經濟倫理上的意義。實際上，我們注意到，在新左派關於經濟民主的早期論述中，經濟民主和經濟效率之間的關係佔有重要地位，而新左派近期的論述重點似乎正在偏離生產領域、轉向所得分配或經濟民主的倫理基礎。

讓我們檢視一下經濟民主在東亞的實踐經驗。2012年的韓國總統選舉一如既往地激烈。但是，中國各界關注的是被視為革新派的朴瑾惠能否戰勝相對保守的李明博，而沒有對這次選舉的經濟議題給予重視。實際上，任何一個朝鮮半島問題觀察家都會明白無誤地指出，這次選舉最重要的經濟議題之一是如何在韓國推行經濟民主。對於試圖在中國推行經濟民主的人們而言，這理應是一個讓人振奮的消息，但是這一消息在中國卻未獲響應。需要注意的是，韓國人在這次選舉中所討論的經濟民主不但涉及我們相對熟悉的韓國勞資關係問題，而且包括如何抑制諸如三星 (Samsung)、現代 (Hyundai) 和LG這樣的壟斷企業，讓經濟增長的成果合理地不同規模的企業間和勞資間進行分配。

無獨有偶，經濟民主這一議題第一次在日本出現的時候，也是和反壟斷問題密切相關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了根除軍國主義，美軍在日本推行了被統稱為「經濟民主化」的三大改革。第一項改革是農地改革。這項改革以極低的價格將地主、特別是在城市居住的大地主的土地賣給農民，從根本上鏟除了農村地區的封建勢力。第二項改革是解散財閥。美軍將財閥家族的成員從壟斷企業的管理層中驅逐出去，壟斷企業的股票被強行出售，財閥家族掌控的核心壟斷企業對於周邊企業的控制被解除。這些措施所產生的影響是明顯而深遠的：財閥家族控制壟斷企業的歷史成為過去，高度壟斷的競爭結構被徹底改寫，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得以確立，出身平民階層的管理者大量地成為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第三項改革是勞動改革。在勞動領域，促進勞資平等的相關法律相繼出台，勞動者和管理者之間的身份差別被消除，團結權、集體交涉權和罷工權受到承認。正是在這些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構成戰後日本企業核心競爭力之一的和諧的勞資關係才得以確立^②。

很明顯，儘管啟動的時期不同，但是日本和韓國的經濟民主都不僅涉及勞資之間的平等，而且涉及資本之間的平等。在經濟民主和經濟效率之間的關係方面，日本和韓國的經驗有所不同。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無法對兩國的實踐進行詳細的分析。但是在總體上，我們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結論：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不同層面的經濟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動了日本的經濟發展；而在同一時期，儘管經濟民主的缺乏似乎並沒有明顯地阻礙韓國的經濟發展，但是卻產生了大量社會問題，以至於成為2012年總統選舉期間社會輿論的焦點並影響韓國的改革方向^②。

讓我們回到中國的討論。如果說中國經濟中存在壟斷，那麼壟斷的主體主要是國企。在自然壟斷行業之外，國企的壟斷地位往往是行政准入制度的產物，而這種壟斷的本質當然是資本之間的不平等。一般意義上的反壟斷法是對資本之間的不平等的調整政策，但是中國的反壟斷法卻為國企設定了特別的保護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資本之間的不平等。因此，如果將經濟平等作為經濟民主問題的邏輯起點，那麼國企的壟斷問題將是無法迴避的。然而，遺憾的是，新左派不但沒有將國企的壟斷問題視為經濟民主議題的一部分，而且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不同層面的經濟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動了日本的經濟發展；同一時期，儘管經濟民主的缺乏似乎並沒有明顯地阻礙韓國的經濟發展，但是卻產生了大量社會問題，以至於成為2012年總統選舉期間社會輿論的焦點並影響韓國的改革方向。

在這裏，有一個關鍵的問題不容忽視：坐視國企的壟斷不但是對資本之間的不平等的縱容，而且是對勞動者階層內部的不平等的放任。原因很簡單：對於民間資本的歧視也是對附屬於民間資本的勞動者群體的歧視；進一步說，對於後者的長期歧視，當然不利於勞動者作為一個階層的團結。中國網民對國企員工，尤其是對壟斷型國企的普通員工的攻擊正體現了這一點。因此，以保護勞動者的利益和強化勞動者階層的團結為己任的新左派學者有義務對這一問題作出回應。

新左派學者沒有觸及國企壟斷問題的原因可能是他們假設國企的效率較民企更高，因此國企的壟斷是可以容忍的「必要的惡」。然而，在學術界對國企的整體效率提出嚴肅的質疑之後，即使是堅決地擁護國企的經濟學家也沒有提出全面而有力的反駁^②。因此，這種整體性的忽視，只能歸因為上文提及的意識形態對問題意識所產生的屏蔽，即新左派學者的國家主義傾向讓他們無法從經濟民主的視角去把握國企的壟斷問題。

關於國企存在理由的論述眾多，但是大多不得要領。筆者認為，只有在開發出原創性的管理經驗、成為制度示範者之後，國企的存在才能夠真正獲得正當性。然而，除了一些局部性的試驗之外，國企在整體上並沒有在制度創新方面取得真正的進展。

關於國企存在理由的論述眾多，但是大多不得要領。筆者認為，只有在開發出原創性的管理經驗、成為制度示範者之後，國企的存在才能夠真正獲得正當性^③。然而，除了一些局部性的試驗之外，國企在整體上並沒有在制度創新方面取得真正的進展。令人驚訝的是，近年來影響巨大的「中國模式」論完全沒有涉及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國模式論者所重視的國企在制度和管理層面的創新^④。這一現象從側面反映了後者乏善可陳。

從經濟民主的角度提出國企的壟斷問題並不意味着私有化是解決國企問題的唯一選項，雖然部分國企的長期無所作為已經使其正當性變得愈來愈低。在筆者看來，在企業內部推行經濟民主並展現效率上的優勢是國企證明其正當性的途徑之一，也是思考如何在當下的中國推行經濟民主時所應該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東亞的經濟民主實踐中，作為日本「豐田生產方式」(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的核心，企業層面的經濟民主被國外的左派學者反覆提及。嚴格的經濟學論證表明，至少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這樣的經濟民主確實有助於提高生產效率^⑤。類似地，眾多政治經濟學家也對德國的產業民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⑥。需要注意的是，企業層面的經濟民主之所以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能夠產生明顯的經濟效益與當時的主流生產方式的特徵有關。在當時的主流生產方式之下，現場工人形成了企業特異性技能 (firm-specific skills) 或產業特異性技能 (industry-specific skills)，而不是在任何行業均適用的普通技能。這種企業特異性技能或產業特異性技能對於企業產品品質的提升以及企業獲得超額利潤具有關鍵意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企業層面的經濟民主才具有了經濟學依據。

但是，世界經濟中的主流生產方式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與這樣的變化相關，在當下中國企業的生產現場之中，勞動者的去技能化愈來愈明顯，很多崗位上的勞動者的技能基本上是普通技能，不再構成企業超額利潤的來源。這樣的變化未必完全封閉了中國企業推行經濟民主的空間，但是卻對中國的經濟民主論者提出了挑戰^⑦。然而，中國新左派似乎根本沒有意識

到上述問題，更談不上做出有效的分析。在筆者看來，新左派沒有重視這一問題的原因之一在於近年來這一派別的國家主義色彩愈來愈明顯，而國家主義的宏大視角使他們很難注意到企業層面的變化。

除了上述問題之外，近年來，中國新左派理論家對於在中國推廣以法團主義為中心的、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特徵的經濟民主的興趣似乎正在降低，對「超越」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民主選項的興趣則在上升。這一現象的出現恐怕和新左派近年來與中國模式論者的結合不無關係：畢竟社會民主主義具有比較明顯的普世價值色彩。達爾是正統民主理論家中對經濟民主問題進行過系統論述的少數學者之一。但是，他的相關論述沒有被新左派有效地運用。這一意味深長的現象至少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意識形態之爭對於中國的經濟民主研究的影響。其實，達爾也屬於中間立場的自由主義者陣營²⁹。類似地，儘管佩特曼 (Carole Pateman) 關於經濟民主問題的研究是這一領域的經典，但中國的經濟民主論者也沒有對其表現出明顯的興趣。或許，佩特曼或多或少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和其作品在中國被冷落的命運有關³⁰。

意識形態對問題意識的屏蔽不僅存在於新左派陣營之中，自由主義者對經濟平等和經濟民主問題的認識也深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首先，除秦暉 (卞悟) 之外，幾乎沒有自由主義者明確地指出經濟民主和經濟自由並非完全對立³¹，因此也幾乎沒有自由主義者從經濟民主的角度來討論國企的壟斷和改革問題。眾所周知，自由主義者一直明確地反對壟斷國企，但是，他們居然沒有將經濟民主視角下的國企壟斷問題作為抨擊新左派、推銷其政策主張的有力工具。對於這一現象，合理的解釋只能是意識形態阻礙了大多數自由主義者認識到經濟民主議題其實具有豐富的內涵。

其次，經濟民主涉及組建獨立工會、發揮勞動者在生產活動中的積極性、組建合作社、貫徹法團主義的原則等具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部分和「全民分紅」、「自由社會主義」等具有激進色彩的部分。客觀地說，具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經濟民主早已成為東亞的日本、韓國和歐洲部分國家的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新左派近年來倡導的具有激進色彩的經濟民主至少在理論上具有很高的價值。實際上，上述兩種經濟民主，特別是前一種經濟民主至少和自由主義中的左翼具有妥協的餘地³²。但是，近年來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卻對上述兩種具有實踐意義和理論價值的經濟民主議題採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

在筆者看來，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之所以有上述表現的原因有二：第一，他們的精英主義民主觀和新左派的大眾主義民主觀的對立使得他們沒有意願誠懇地面對新左派倡導的經濟民主議題；第二，他們所信奉的市場主義主要以美國的實踐為樣板，在相當程度上是美國式市場主義。與德國、日本不同，經濟民主在美國經濟中的地位並不突出。因此，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自然對經濟民主缺乏興趣。

在這裏，一個必須指出的問題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整體上忽視了資本主義多樣性問題。資本主義多樣性一直是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核心議題，相關研究已經成熟³³。在資本主義多樣性論者看來，在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下，資本主義經濟可以有不同的組織方式，美國經濟的組織方式並不是市場經濟的唯

近年來，中國新左派理論家對於在中國推廣以法團主義為中心的、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特徵的經濟民主的興趣似乎正在降低，對「超越」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民主選項的興趣則在上升。這恐怕和新左派近年來與中國模式論者的結合不無關係。

一最優解。至少在上世紀末之前，奉行自由主義原則的美國自由市場經濟 (liberal market economy) 和強調制度的作用的、以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的協調型市場經濟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 在總體效率上並沒有明顯的優劣之分^②。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資本主義多樣性在勞資關係的制度結構上體現得最為突出^③。另外，即使在美國經濟似乎開始走強的二十一世紀初期，其優勢也並不是存在於所有的產業。不要忘記，當下美國經濟危機的源頭之一就是美國三大汽車企業的衰退，而這種衰退主要是由日本汽車企業的競爭造成的^④。

毫無疑問，自由主義的傳播對於中國的發展已經產生了並正在發揮着重要影響，但是如何讓自由主義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卻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一直沒有成功地解決的問題。必須指出的是，在中國的階級分化和社會矛盾已經發展到無法無視的情況下，新左派提出的經濟民主議題切實地回應了中國的社會現實。如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無法對這樣的議題作出有力的論述和回應，那麼自由主義的頹勢有可能持續下去^⑤。

必須指出的是，在中國的階級分化和社會矛盾已經發展到無法無視的情況下，新左派提出的經濟民主議題切實地回應了中國的社會現實。如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無法對這樣的議題作出有力的論述和回應，那麼自由主義的頹勢有可能持續下去。

近年來，一些自由主義者在維護弱勢團體的權利、伸張社會正義方面表現出了值得稱道的道德勇氣，但是一般公眾對於自由主義仍然心存疑慮。比如，中國的公眾當然會擔心經過自由主義改造的國企是否會為特定階層把持、為自由主義所主導的經濟改革是否會進一步惡化已經非常嚴重的所得分配問題。面對這些疑慮，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特別是其中的左翼自由主義者有責任作出更多的承諾。筆者所說的自由主義者不僅包括知識界的精英，而且包括持自由主義立場的企業管理者和專業人士。

在這裏，回顧日本企業管理者群體在戰後經濟民主的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或許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強調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的意義上，在財閥家族成員被驅逐之後進入管理層的管理者大多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義者。這些自由主義者大多來自中產階級家庭並長期供職於同一企業。他們的中產階級背景意味着他們和社會底層具有比較直接的聯繫，而長期供職於同一企業的經歷則使得他們保持了對於員工群體的歸屬感^⑥。由這些自由主義者組成的「經濟同友會」不但積極地在社會上宣傳企業是由資本家、勞動者和管理者共同組成的社會公器 (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極具衝擊力的理念)，而且在企業內部大力實踐經濟民主。日本輿論公認，在日本經濟的整個高度成長期，「經濟同友會」在很多議題上都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⑦。面對日本同行的創造性貢獻，自詡為進步力量和自由主義者的中國企業管理者能否作出符合時代背景和中國現實的回應，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他們的歷史地位。

三 經濟民主：從擋箭牌到助推器

總的來說，大眾主義民主觀與精英主義民主觀的對立影響了左右兩翼關於經濟民主問題的基本認識，而國家主義和市場主義的對峙則進一步放大了左右兩翼的分歧，並使中國的經濟民主之爭處於黨同伐異、言不及義的狀態。具體

來說，「主義」之爭讓新左派沒有認識到國企在當下的中國有可能演變為經濟民主的阻礙力量以及在推行經濟民主時會受到主流生產方式的極大制約；類似地，「主義」之爭也讓自由主義者沒有認識到具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經濟民主和自由主義很可能並不存在根本的衝突、某些經濟民主選項可能有助於推動經濟發展。

「主義」對「問題」的屏蔽在一定程度上使經濟民主議題成為了左右兩翼共同的擋箭牌，儘管這面擋箭牌在兩派手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對於新左派來說，自由主義者對經濟民主議題的徹底否定，使得他們有理由對自由主義者推崇的憲政民主充耳不聞；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新左派的個別論述瑕疵以及自由主義者自身對於經濟民主的狹隘解讀，使得他們可以對經濟民主議題所蘊含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以及新左派關於理想政體的浪漫但並非毫無意義的想像視而不見。在這樣的對陣之中，或許對於中國來說最為危險的一種前景正在隱約浮現——新左派不但開始擁抱文化保守主義，甚至可能和極左派結合；而部分自由主義者也有走向極右翼的趨勢。

「經濟民主」是一個複雜甚至有些混亂的概念。但是，以下兩個視角或許有助於澄清我們的認識：第一，平等是經濟民主的邏輯出發點，而經濟平等包括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平等、資本與資本之間的平等，以及勞動者階層內部的平等。因此，基於平等原則的經濟民主必然包含與上述三種經濟平等相關的三種經濟民主。第二，經濟民主可以區分為具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經濟民主和具有激進色彩的經濟民主。這裏所說的具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經濟民主，既包括韋伯夫婦在十九世紀末倡導的產業民主，也包括德、日等國在二十世紀後半期所實踐的、以宏觀和微觀法團主義為表現形式的經濟民主。

或許可以說，是否接受具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經濟民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作為判斷一個思想派別對於民主的真實態度的試金石。原因很簡單：除了可能具有的經濟價值之外，這種經濟民主也在不同的層面為勞動者行使民主權利提供了學習的機會，而這種學習的意義當然是重大的。另一方面，我們完全可以在推行具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經濟民主的同時，對具有激進色彩的經濟民主的可行性進行研究甚至在局部進行試驗。從以上立場出發，左右兩翼不難找到共同關心的問題並展開認真的討論，而這樣的討論有可能使經濟民主這一議題從左右兩翼抵擋對方批評的擋箭牌轉變為促進中國社會發展的助推器。

大眾主義民主觀與精英主義民主觀的對立影響了左右兩翼關於經濟民主問題的基本認識，而國家主義和市場主義的對峙則進一步放大了左右兩翼的分歧，並使中國的經濟民主之爭處於黨同伐異、言不及義的狀態。

註釋

① 宋磊、孫曉冬：〈經濟民主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基於生產方式視角的分析〉，《經濟學家》，2011年第11期，頁5-12。

② 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4年8月號，頁5-16；〈再論「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兼答各位評論者〉，《二十一世紀》，1995年2月號，頁134-45；〈三論制度創新與「第二次

思想解放]——答卞悟》，《二十一世紀》，1996年4月號，頁127-34；〈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讀書》，1996年第3期，頁11-21。

③ 崔之元：〈小康社會主義與中國未來：小資產階級宣言〉，www.cui-zy.cn/；王紹光：《民主四講》（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251-55；汪暉：〈再問「甚麼的平等」？——論當代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脫節（上）〉，《文化縱橫》，2011年第5期，頁66-81。

④ 卞悟：〈「制度創新」還是制度復舊？——再問崔之元先生〉，《二十一世紀》，1996年8月號，頁128-34；高華：〈鞍鋼憲法的歷史真實與「政治正確性」〉，《二十一世紀》，2000年4月號，頁62-69。

⑤⑬ 崔之元：〈重慶實驗的三個理論視角：喬治·米德與葛蘭西〉，《開放時代》，2011年第9期，頁52-65。

⑥ 筆者也參加了關於經濟民主的研究。因此，如果說本文對新左派的經濟民主論有所批評的話，那麼這種批評首先是指向筆者自己的。另外，在這個議題上自由主義者批評多、建設少，因此本文主要圍繞新左派的研究展開。參見宋磊、孫曉冬：〈經濟民主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頁5-12。

⑦⑨ 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著，馮克利、閻克文譯：《民主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22；22-23。

⑧⑩ 王紹光：《民主四講》，頁242-43；3-10、33-54。

⑪ 崔之元通過對盧梭的重新解讀論證了人民主權的原理。參見崔之元：〈盧梭新論〉，《讀書》，1996年第7期，頁45-55。

⑫ 崔之元：《「看不見的手」範式的悖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⑭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王紹光：〈大轉型：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雙向運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頁129-48。

⑮ 鄧正來：〈關於「國家與市民社會」框架的反思與批判〉，《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3期，頁5-9。

⑯ 顧昕：〈譯者後記：以社會制約權力——達爾的多元主義民主理論與公民社會理念〉，載達爾(Robert A. Dahl)著，顧昕譯：《民主理論的前言（擴充版）》（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頁168。

⑰ 王紹光：〈關於「市民社會」的幾點思考〉，《二十一世紀》，1991年12月號，頁102-14；〈「公民社會」祛魅〉，《綠葉》，2009年第7期，頁66-72。

⑱ 崔之元：〈經濟民主的兩層含義〉，《讀書》，1997年第4期，頁79。

⑲ 王紹光：〈關於「市民社會」的幾點思考〉，頁111。

⑳ 崔之元：〈盧梭新論〉，頁45-55。

㉑㉒ 關於「經濟民主化」的詳細討論，參見下川浩一：《日本の企業發展史：戰後復興から50年》（東京：講談社，1990），頁18-58；277。

㉓ 宋磊：〈產業民主與日韓模式的分殊〉，《文化縱橫》，2011年第2期，頁106-10。

㉔ 參見《國企》2011年第7期楊帆、余斌等人的評論。

㉕ 宋磊：〈企業創新：大國崛起的微觀基礎〉，《文化縱橫》，2012年第4期，頁93-97。

㉖ 關於中國模式論，參見黃平、崔之元主編：《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俞可平等主編：《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張宇主編：《中國模式：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潘維主編：《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鄭永年：《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姚洋：《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張維為：《中國震撼：一個「文明

型國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丁學良：《辯論「中國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⑳ Masahiko Aoki,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49-98.

㉑ 參見William Lazonick, Ronald Dore, and Henk W. de Jong, *The Corporate Triangle: Th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Systems in a Global Economy* (Malden, MA: Blackwell, 1997); Wolfgang Streeck, "German Capitalism: Does it Exist? Can it Survive?",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 Mapp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ed. Colin Crouch and Wolfgang Streeck (London: Sage, 1997), 33-54; Margarita Estevez-Abe, Torben Iversen, and David Soskice, "Social Protec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Skill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ed. 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5-83; Kathleen Thelen,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9-91。

㉒ 在當下的主流生產方式之下推行企業層面的經濟民主仍然是可能的。參見宋磊：〈道爾—岩井論爭與利益相關者論的系譜及其演變〉，《政治經濟學評論》，2011年第3期，頁101-103。

㉓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㉔ 佩特曼 (Carole Pateman) 著，陳堯譯：《參與和民主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㉕ 秦暉：〈相克亦相生〉、卞悟：〈經濟競爭中的「規則」與「起點」〉，載劉軍寧、王焱、賀衛方編：《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16-21、148-64；陳赤軍、葉煥庭：〈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讀書》，1997年第9期，頁108-12。

㉖ 關於中國自由主義中的左翼，參見張千帆：〈中國「自由派」與「民主派」：提前對決與殊途同歸〉，《二十一世紀》，2012年6月號，頁5-6。

㉗ 關於資本主義多樣性問題，在比較政治經濟學之中存在以經濟學和政治學為理論基礎的、密切相關的兩個流派。關於前者，參見Masahiko Aoki, *Towards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Bruno Amable, *The Diversity of Modern Capi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關於後者，參見 *Varieties of Capitalism*；朱天飆：《比較政治經濟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㉘ 參見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20。

㉙ 顧昕：〈市場經濟的多樣性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二十一世紀》，2008年8月號，頁17-26。

㉚ 採取自由主義立場的美國經濟學家和媒體往往將美國汽車產業的衰退歸咎於其福利制度所導致的工資成本劣勢。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在北美市場，日本和美國兩國汽車企業在生產效率方面的差距直到今天也仍然存在。

㉛ 關於中國自由主義的頹勢，參見姚中秋：〈中國自由主義二十年的頹勢〉，《二十一世紀》，2011年8月號，頁15-28。

㉜ 道爾 (Ronald P. Dore) 著，宋磊譯：《企業為誰而在：獻給日本型資本主義的悼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